

第一章 道 教

道教，综罗百代，博大精深。在中国历史上，“道教”一词曾被赋予广泛的涵义。例如，诸子百家都曾以其来称呼自己的各种理论和方法，等等。然而，本书所说的道教，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，沿袭方仙道、黄老道的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，以“道”为最高信仰，相信人通过某种实践和一定修炼，有可能长生不死成为神仙的中国本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。

道教，又称黄老之教，肇始于黄帝，弘扬于老子，成教于张天师。黄帝，姓姬号轩辕氏，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共同祖先，公元前 2698 年建立王朝，被尊为“黄帝”。相传黄帝为中华文明的创始者，但却没有留下什么有关“道”（即关于自然宇宙与人生社会存在与变迁的义理）的理论。然而，后来形成的道家（即先秦时期形成的一个思想派别，以老子、庄子为主要代表）和道教却赋予了很多“道”的思想。传说其曾撰有《九幽讖》使“道”有了更深的渊源。所以，浙江杭州历史悠久的道教场所黄龙洞山门有“黄泽不竭，老子其犹”八个字，说明了道教源于“不竭”之“泽”的黄帝。老子名耳，号伯阳先生，又叫老聃，“老子”为其尊称。春秋战

国时期人，曾在都城洛阳任周“守藏室之吏”（即图书馆小吏）。后辞职骑青牛西去，过秦国散关（即今陕西宝鸡西南）时，写下了五千言之《道德经》（又名《老子》），即为中国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，也是中国道教的经典之作。东汉永和六年（公元141年），江苏丰县人张陵宣称太上老君授予道法，创立了五斗米道（因要求入道者须得交五斗米故名）奉老子为教主以《道德经》为主要经典。道教就这样开始形成了。约于东汉灵帝熹平年间（公元172—178年）张角创立了太平道，奉《太平经》为主要经典，以“太平”理想为号召，吸引广大苦难民众。后来，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合流，道教理论日趋完善，形成了以尊崇黄帝、老子、神仙方术为特征，以老子为教主，以《道德经》为主要经典的天师道。后人也称张陵为“天师”。此后，各种教派又相继确立，主要有北天师道、南天师道、正一道、全真道、上清派、灵宝派、楼观派、神霄派、清微派等。早期道教主要在下层群众中流行，并且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，与广大农民反对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斗争结合起来。然而，农民起义都先后失败了。尽管如此，道教影响却逐渐扩大，天师道的斋醮科仪、教义规戒、符篆咒语也慢慢流播四方。

两晋南北朝以后，道教开始由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发展，至唐代被提到了极高的地位。唐高宗以老子为李氏的祖先，封予“太上玄元皇帝”尊号，唐玄宗则即将唐高祖、唐太宗、唐高宗、唐中宗、唐睿宗五尊像陪祀于“玄元皇帝”老子像旁，并把道士视为宗室，以宰相领道观；唐玄宗亲自为《道德经》作注疏，还规定士庶均要家藏一本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列子》为真经等等。

宋代真宗、仁宗、徽宗也均尊崇道教，尤以徽宗为甚。真宗

命诸大臣与礼官等给先祖赵玄朗议上尊号曰“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”，同时尊奉老子为“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”。徽宗则自称为“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”降生，自封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。宋代还大造宫观，诏谕天下访求道教仙经，编辑《道藏》校定雕版并于太学置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博士等。

元代，全真道丘处机率领十八弟子，历经四年艰难跋涉，万里迢迢谒见成吉思汗，向他献上“不嗜杀人”、“敬天爱民”、“清心寡欲”等建议，作为一统天下、治理国家和“长生久视之道”，甚为成吉思汗重视。他从漠北回来时，成吉思汗派千骑相送，沿途“迎者动数千人”。真是“去时筇路蓝缕而去，归时荣华衣锦而归”。

明代对正一道特别重视，尤以明世宗为甚。世宗自号“玄都境万寿帝君”，亲自斋醮，并任命道士邵元节、陶仲文担任朝廷重要官职，参与朝政。明代对道教典籍的整理也十分重视，正统十年（1445年）和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先后编纂正、续《道藏》，计5485卷。

清代，乾隆皇帝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，并把张天师由二品衔降为五品衔。于是，道教的上层政治地位迅速下降，一蹶不振。它在上层社会的影响也日渐削弱，趋于式微。然而，由于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，道教在民间却仍然有较大的影响，祈祷、斋醮仍然广泛流行于汉族地区，并且一直沿袭至今。

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，吸取了儒、佛、阴阳、星相等各家思想，还融合进医学、武术及民间祀神、健身、养生等方法，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宗教。道教的教义强调一个“道”字，认为“道”是“虚无之系，造化之根，神明之本，天地之元”；“万物以之生，五

行以之成”即万物、阴阳及至整个宇宙都是由“道”化生的。

道教供奉的神明系统十分复杂，主要有三清（玉清原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，即老子为道教最高之神）四御（玉皇大帝、中央紫微北极大帝、勾陈上宫天上帝、后土皇地祇）日月五星（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诸星）四方之神（东方青龙、南方朱雀，西方白虎，北方玄武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大批民间俗神。然而，在本书中，除了影响较大的神灵（如妈祖、关帝、保生大帝等）外，明代以后出现的其他大部分民间俗神则归入民间信仰神明范畴。

道教在数千年的传播过程中，对我国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医学、科技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对各地的风俗民情影响更是十分深远。因此，鲁迅先生在《致许寿裳》一文中说：“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……以此读史，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。”

第一节 在晋江的传播

一、唐、五代及此前的晋江道教与有关传说

（一）秦、汉的有关传说及元妙观的创建

道教来源于原始宗教的鬼神观、古代巫术以及秦汉时期的神仙思想、神仙方术。据载，早在秦汉时期晋江就有神仙方士的活动。道光《晋江县志·仙释》载：“秦大道不知何许人。修真

清源左峰，后人供奉之，名大道岩。”民间传说，秦代晋江有一位名叫大道、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人，在出游途中，碰到一人哭泣，问道：“何以哭？”答曰：“始皇筑城征夫 家中一子难逃其役。”大道深受感动，即代其子服役。后来，他在地得道而回归晋江，修真于城北清源山左峰芭蕉洞。后人即据此传说，在清源山芭蕉洞供奉大道 称该地为大道岩。《晋江县志》还载：“汉 陈寨，善禁咒术 为人治病多愈。”据五代徐铉撰《稽神录》载 其时漳州人苏猛一子病狂，人莫能治，乃往请陈寨。寨至，苏氏子见而破口大骂。陈寨遂告知苏氏，其子病已入心，但可救治，遂设坛于厅堂。是夜，陈寨把苏氏子劈为两半，悬挂于厅堂东壁，心脏则悬挂于北檐之下。陈寨即在厅堂作法，不料所悬之心却被家犬所食。陈寨见状大惊，乃持刀宛转于地，后出门而去。俄顷手持心脏回来，塞入苏氏子腹中，即披头散发，大声喝斥，苏氏子之腹遂合无恙。然而 苏氏子返生后 却连声高呼：“递铺 递铺！”苏家人皆莫知缘由。后来，才获知同日距苏家数里处，有一驿吏手持官方文书死于道旁。陈寨乃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之子。“递铺”乃驿吏走近前面递铺时提醒前站做好急递准备的口头语。虽然这两个传说均荒诞不经，但却反映了古代晋江在道教流传以前方士巫术的情况。

东汉末期，天师道开始创立，至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一定发展。一些以修道炼性、守志养生的方士则隐居山林，或游历名山采药炼丹。吴、晋时，著名道士左慈、葛玄、郑思远都曾相继入闽云游或修道。晋江内坑瑞云岩有葛仙翁寄迹之处，故名“仙境”；据传显道化杖为龙 又地号“葛州”。

南北朝时，大批晋人南渡入闽，进一步传播了先进的中原文

化与道教信仰。西晋太康年间（公元 280—289 年）晋江建造了最早的道教官观——白云庙，后改为元妙观。《晋江县志·寺观志》载：“元妙观，在县前，晋太康中为白云庙……”白云庙为八闽第一座道教官观，主要供奉三清尊神、玉皇上帝及道教正统神祇。由此可见，西晋时期道教在晋江已经颇为流行。东晋末年，信仰天师道的孙恩、卢循起义军在被刘裕击败后，部分起义者流散在晋江沿海，被称为“游艇子”，又进一步传播了道教信仰。

（二）唐代的道教活动

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达、国力强盛的封建王朝。唐代，最高统治者尊崇道教，称老子为祖先，自认是其后裔。在封建王朝的扶持下，道教又得以迅速发展，达到鼎盛时期。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，晋江经济、文化也得到很大发展，人口迅速增多，从而为道教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；尤其是唐代中后期，北方战乱频繁，而晋江地处东南海隅，受战乱影响较少，社会相对稳定，更为道教的兴盛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。20 世纪 90 年代初，泉州东门外东岳行宫附近发现一座唐墓，其券顶墓砖打印有“上柱国刺史 乾封二年”；另一面打印“武吕中平安大吉”。乾封二年为唐高宗李治时期的公元 667 年；“武吕中平安大吉”是道教吉祥赞语；而墓主又是一位官员，其墓葬砖上打印着此类道教赞语，可见唐初晋江一带道教是很盛行的。

唐景云二年（711 年）郡治南移，武荣州改称泉州。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，经济文化的繁荣，道教也有了新的发展，一些道教官观又应运而生。唐神龙元年（705 年）白云庙改建为中兴观。不久又改为龙兴观。开元中又改为开元观，而以老君

祠为龙兴观。唐代晋江建造的道教官观还有紫极宫、金粟崇真观等。据《晋江县志》载：“紫极宫在元妙观之右，旧在行春门外。唐天宝二年（743年）赐名紫极。”“金粟崇真观在府城西南三十三都金粟洞，唐时建”。清源山龟岩建有一龟山广利尊王庙，祀一陶氏者。据《晋江县志》载，陶氏者为唐时人，某日偶遇二位异头怪面者，知欲投毒毙郡人命，遂设法让其拿出毒药，抢而食之，立即化身。郡人争舁其法身，供奉于郡左柴余宫。后发现香烟飞扬，直诣清源山龟峰，且其地夜有毫光，知神意属此，即岩创庙，舁法身祀焉。石狮永宁宝盖山上建有一虎岫寺。寺中清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立、“温陵郡稟生高攀撰、里人邑庠生高汝霖书”之《重修虎岫禅寺碑辞》载：“虎岫，泉南一大胜概也。屏山环海，巨石雄奇，佛影流辉，鹄立西峙，中建寺宇，崇奉玄天上帝。为稽其始，肇自大唐贞观之世；至宋绍兴，蔡君梦良（按：应该是‘蔡梦良、蔡汝霖兄弟’）护以石亭，及明嘉靖，云翥（按：即‘吴云靖’）禅师养性，按字迹不清，疑为‘修’字，真道心入妙，募化修葺者三，尝云游京师，施大法力，始敕封为虎岫禅寺。”若此虎岫寺当建于唐贞观年间（627—649年），但笔者疑其有误，下文将再详述。先载于此以备考述。

据郑焕章研究员考证，唐代晋江县城隍庙已经建成。因为清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晋江知县黄昌遇在《重建晋江县城隍庙碑记》中写道：“我晋之有城隍庙也，始于唐，历宋元明，屡有迁移，规制不可考。”郑先生认为，此说是可信的。理由有二：一者，据研究，我国城市一经诞生，城隍信仰也随之出现；而唐开元六年（718年）即析南安县城东南部设置新县——晋江县；县治在今鲤城区内，州县同城而治。二者，唐代泉州道教已经有了一定发

展，因而作为道教神仙系统中重要神祇的城隍，必然要在泉州占有一席之地，受到建庙供奉（详见郑焕章：《泉州一城三城隍庙考》，《泉州学刊》1995年第1期）。笔者甚为赞同这一观点。遗憾的是，县城隍庙当时建造的确切时间和具体地点已无从查考，甚至连自宋至明朝前期屡经迁移的时间和地点也难以知晓。城隍原为古代神话中守护城池之神，后被道教奉为神灵祭拜。关于城隍之祭始于城市兴起，历来有始于尧祭八蜡和始于祝融两种说法，但后来仿佛以始于尧祭八蜡较为流行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厦门大学颜亚玉教授撰文认为，从古文字学、古典文献以及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来看，水庸之祭属农事崇拜，水庸应为水沟，因此城隍之祭始于尧说并不可信。祝融作为中国早期城池的创建先驱，本是城隍的真正原型，只是后来与黎相混，才演变成为火神，而城隍之祭始于祝融反而湮没不传。因此，城隍的真正原型应该是祝融（详见颜亚玉：《城隍祭起源与城隍原型探析》，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99年第2期）。笔者感到这一观点甚可令人信服，故录载于此，以供同行进一步深入探讨。

唐代，晋江出现了一批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。他们的修炼和研究，对道教在晋江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蔡如金是其中一位道术精深的著名道士。据乾隆《泉州府志·方外》载蔡如金其先会稽人，任岭南节度使。唐永徽初年回家，路过泉州，罹疾卒，葬南安。蔡如今遂居南安，后以荫补入仕为金部员外郎。守太原有惠政。晚年弃官归隐于泉州紫极宫精思院，辟谷御炁，以方技济人，后炼丹于北山清源紫泽洞。紫泽洞左侧有一藜杖泉，据传为蔡如金握藜杖戮之而泉出故名。相传，其时有驱使君者，也有道术。一日，两人结伴同游于泉州笋江，遂进行比

试。他们结绳连接江之两岸，邬使君走丸于绳上，蔡如金则走丸于绳下；邬使君乘席于江面，顺流而下，蔡如金则乘席于江面，逆流而上。后两人又同游于南安九日山下金溪。在榕树下休息时，蔡如金口中含酒喷射榕树，树叶遂散落于地，复又含酒喷射地上落叶，落叶即飘到树上恢复原貌，可是，邬使君却做不到。此外，民间还流传着蔡如金于石碓村驱蛇和金田村救女的神话故事。《晋江县志》载，蔡如金仙逝后，“葬宁寿寺。留从效筑罗城，徙之松湾。启棺，惟剑镜在焉。后陈洪进以其地建崇福寺，迁葬于北山下。宋崇宁（1102—1106年）中封虚应先生。其后累加善利、灵济。嘉定十三年（1220年）守真德秀祷雨叠应，闻于朝，诏加号昭博真人。”

唐代，晋江另外两位著名道士是郑文叔和蔡明浚。郑文叔，号元德真人，修炼于晋江紫帽山。据传，有一位客居洛阳的泉州人碰到一羽士，羽士请他面交一封信给泉州金粟洞之真人。他把信送到时，郑文叔给他半升谷子犒劳。他归家后，谷子即变成黄金。后来，人们便把郑文叔修炼的紫帽山洞称为“金粟洞”。据云，洞之岩石上的“金粟之洞”乃宋宁宗所书。蔡明浚居住在晋江灵源山，与虹岩逸人罗山甫往来于灵源与潘湖之间，有合炼道术之雅事。其时，泉州名士欧阳詹也曾前往灵源山，与二位道人同修道术三年。

惠安名道士吴崇岳曾入龙兴观（即“元妙观”）为道士，收精炼气，休粮轻身。据《泉州府志》载，龙兴观中有古松柏，吴崇岳能轻身缘木而上，如履平地，直至树梢行礼拜仪式。其时转运使周谓按部至泉州，闻吴崇岳有异能，登门拜访，偕同西行至今德化县东部地面，见有古松高百余尺，上筑有鹤巢。转运使周谓即

命吴崇岳登树。转眼之间，只见吴崇岳已飞步至鹤巢顶礼膜拜。周氏甚为敬佩，遂赠诗云：“楮为冠子布为裳，吞得丹霞寿最长。混俗性常乐道，出尘风格早休粮。枕中经典谁传与，肘后仙方自写将。百尺松梢便飞去，鹤栖枝上礼虚皇。”后来，吴崇岳奉召赴阙，赐号“通元先生”。

唐代晋江的著名道教学者有罗隐等人。罗隐（833—909年）原名横，字谄谏，号江东生，浙江余杭人。他秉性聪敏，擅长诗赋。据《五代史·补》载，他“在科场恃才傲物，尤为公卿所恶”，故“十举不中”。由于科场失意，志不得申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使他受到沉重打击。于是，他改名“隐”，开始南下的流浪生活。约在咸通、乾符年间（860—879年），流寓到福建。他尝游晋江罗裳山和惠安螺山修真学道。《闽书》云：“唐末罗隐乞食山下，人侮之，隐乃画马于石，每夜出食人禾，追之则复入石。山下人乃改礼焉，隐为画楯系马，马不复出……”画马石乃晋江罗裳山玉髻峰下一巨石。巨石东面镌有一匹简笔写意的“马”：左、右边几笔均皆正竖；中间两横稍作弧状，连接着左右正竖之笔，并着两笔短竖。如此看来，仿佛一匹马被系在一木楯之上。整个画面长4.4米，宽2.25米。“画马石”曾被载入《中国名胜大词典》，画马石的故事在晋江广泛流传。清雍正年间（1723—1735年）陈一策在《玉髻峰前观石壁画马诗》中写道：“笔力所到石已吞，墨沉淋漓胜镂刻。苔侵萝缠尚宛然，雨淋霜剥不能蚀。应知造化钟神异，鬼物护持宁可测。矫矮龙性聚精灵，日日神游周八极。樵牧相传振鬣鸣，往往声闻风雨夕。”除画马石外，据云，晋江深沪镇北石壁山之狮头石岩顶的“深沪”二字也为罗隐所书，可惜现在已被埋在新建筑物底下，未能看到。此外，民

间还流传着罗隐在双髻山下赶石头、碗窑村讨破碗等神话故事。据《晋江县志》载：罗隐在“光启中（885—888年）归钱镠为从事，后表授给事中。年八十余卒。”罗隐一生著作甚丰，有《谗书》、《谗本》、《淮海寓言》、《湘南应用集》、《甲乙集》等行世。

（三）五代的道教及谭峭的《化书》

五代十国的帝王因袭唐代风气，不少人也崇信道教。五代时期闽王政权也是这样。晋江王留从效、节度使陈洪进均既是佛教的推崇者，又是道教的倡导者。他们亲近道士，兴建道教宫观，开展道教活动。五代末，留从效改建紫极宫于泉州城迎恩馆之西庑，陈洪进则兴建奉先观。刺史王潮则奏请朝廷，赐封泉州首邑东郊东湖上的万氏妈为“护国英烈万氏仙妃”。《晋江县志》载，据传万氏仙妃原为万氏女，居泉州城东郊东湖边。生前能为人治病，死后又为朝廷捍患。唐乾符六年（879年）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人闽，至惠安斩处士周朴，欲攻泉州城。军队来到泉州城前，忽闻空中传来声音：“未说泉州境，且说东湖一万家。”昂首空中，却未见踪影。黄巢军队惊惶失措，匆忙逃遁。原来是万氏妈显灵帮助官军。王潮为此即请封于朝，并建庙于东郊仁风门外东湖上，祀万氏仙妃，庙额“广灵”。然而，正如吴幼雄教授在《泉州宗教文化》一书中所指出：“从历史事实看，唐朝黄巢农民军人闽后，仅仅占据福州，后循原路进入江西，并未经过惠安、泉州境，故泉州东湖万氏妈的为国捍患的传说，系以后道教徒附会上去的。”王潮任刺史时，曾在三十八都城东五里处建一忠显庙，供奉刘行全及与其同死者三人。据载，刘行全是光州固始人，随王绪来到泉州，王绪因忌而杀之，故有此庙奉祀。

五代闽王康宗王昶也崇信道教，曾拜著名道士、道教学者谭峭为师，赐号“正一先生”；南唐元宗李璟即召谭峭至建康，赐为“紫霄真人”，可见他对谭峭同样是非常敬仰的。谭峭，字景升，晋江人。其父谭洙为国子监司业。谭峭自小聪明颖异，虽颇涉经史但不求仕途进取而尤喜爱黄老诸子及《穆天子传》、《汉武帝内经》与《茅君列仙内传》等道书。后辞父出游终南、华、岱诸名山，师嵩山道士十余年，得辟谷养气之术。居南岳炼丹服食，内养外炼均有成效。他以酒为乐，行为异于常人，尝醉游，夏着乌裘，冬衣葛衫，或卧霜雪中。他在云游途中，经常口念：“线作长江扇作天，鞞鞋抛在海东边。蓬莱信道无多路，只在谭生拄杖前。”谭峭曾居江西庐山栖隐洞，据传能役使鬼神，测人祸福。后来，他回归本籍，修炼于泉州北郊清源山紫泽洞，宋开宝六年（973年）尸解于洞中。后来，民众把他奉为神灵。清源山下洞原有三真人庙（俗称“仙公宫”）即供奉紫霄真人（即谭峭）与蔡真人（即蔡如金）董仙公（即董伯华）可惜现在已经无存。

谭峭著有《化书》一书。《化书》分为“道化”、“术化”、“德化”、“仁化”、“食化”、“俭化”六卷，共110章。全书中心为一个“化”字；主要运用道家哲学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，以类推比附手法，从事物的变化中阐述修道成仙的思想，探求社会治乱的因由，指出实现太平之世的道路。《化书》称世界起源于虚，“虚化神，神化气，气化形”最后复归于虚，万物皆由虚和实转化而来，以无形影，无寒暑，无生死，齐昏明，齐奢俭，外荣辱，黜是非，忘祸福，泯灭一切差别，以实现“虚实相通”之“大同”境界。虽然谭峭在论述事物转化时不考虑任何条件，所举例子也往往带有主观意识，但他以“万物皆化”立论，突破了“静生万物”之说，恢复

了老子“生生不息”的思想；在论述宇宙万物生成问题上也比以前更加系统，更加充分，并且也已经感到万物生灭变化自然法则的不可抗拒性。因此，《化书》不仅在社会历史观上有突出成就，在哲学思想、内丹理论发展史上同样都有重要地位。从北宋陈抟开始，直到元全真道十方丛林之規制，都把《化书》作为必读的经书。

二、宋代晋江道教的兴盛

两宋时期，晋江道教在经历了唐、五代初步发展阶段的基础上，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进入了鼎盛时期。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，尤其与泉州港在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地位的上升有很大的关系。晋江地处东南沿海，受北方战乱影响较少，政治上相对稳定，经济文化也较为繁荣。北宋时期，泉州港的地位继续上升，海外贸易迅速发展，出海经商者比前代增加，范围北及朝鲜，南至占城，与广州、明州并列为全国三大海港。北宋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在泉州设置了提举市舶司。南宋时期，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，海外贸易的发达，加上南宋政权的苦心经营，泉州港空前繁荣，与广州并驾齐驱，成为全国最大的海港，也成了外国使节出入的门户和外国侨民的集居地。于是，伊斯兰教、佛教等多种宗教在泉州地区非常活跃，集儒、道、释文化之大成的理学在泉州也十分流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晋江道教的兴盛是势所必然的。下面即分三方面进行阐述：

（一）宫观的兴建

北宋大中祥符年间（1008—1016年）深沪创建崇真殿，供奉玄天上帝；同一期间，始建于唐代的开元观改为天庆观。宣和六年（1124年）龙湖前港村建筑真如宫（又称“真如殿”）奉祀玄天上帝；并于开禧年间（1205—1207年）、宝庆年间（1225—1227年）两次进行重修。此外，泉州东郊法石街石头山上也建造了法石真武庙，同样供奉玄天上帝，南宋时嘉定（1208—1224年）绍定（1228—1233年）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在《真武殿祝文》中云：“于皇上圣威神在天。诞降福泽于民，俾有宁宇。”由此除了可以看到真德秀的爱民之心外，也可以看到道教在晋江之流行。宋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年），尚书张汝锡在晋江县邑仁风门外凤山之阳建造了东岳行宫。东岳行宫，为道教供奉四方神之一——东方青龙的行宫。据传，天下五方之山以泰山为东岳。《虞书》云：“舜东巡狩至于岱宗”，岱宗即指泰山。东岳行宫之始建在唐高宗乾封元年（666年）。是年赐封泰山为东岳，敕郡国建东岳行宫以祠青帝。泉州东岳行宫即属此类行宫。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年），宗室赵汝锡在府治东凤山麓建造忠义庙，祀汉代关羽与唐代张巡、许远，后来又增祀岳飞、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、苏缄、赵昂发。嘉泰年间（1201—1204年）清源郡公曾从龙重建城西铁炉铺铁炉庙。该庙祀奉应魁圣王，为文章司命。据传，曾从龙未第时，曾祷于铁炉庙，梦有幅纸书云：“两爨并辉于今秋，一荐独横于天下。”宁宗庆元五年（1199年）殿试时，果然被擢进士第一，故曾从龙有是举。

《晋江县志》载：“府城隍庙在府治北，即资寿寺故址。旧在

治东萼辉铺，宋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侍郎赵涯建，名明烈王庙。明洪武二年（1369年）封监察司民显佑伯，三年（1370年）改称城隍之神，四年（1371年）知府常性重建。”由此可知，北宋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侍郎赵涯在府治东萼辉铺（即今东门镇抚司巷）建造了府城隍庙。其之所以称为明烈王庙，可能是由于城隍神当时被封为“明烈王”的缘故。据郑焕章研究员考证，该城隍神是北宋名相韩琦之父、泉州知州韩国华。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朱元璋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之时，明烈王庙才改称为府城隍庙。但《晋江县志》此处记载赐封似乎有误，下文将再阐述。

前已述及，石狮永宁宝盖山上建有虎岫寺。据寺中清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所立《重修虎岫禅寺碑辞》载，其“肇自大唐贞观之世”。然而，《碑辞》中所载情况是矛盾的。因为既然唐代贞观年间（627—649年）已经建造了虎岫寺，经过500左右年后的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年）何需再由蔡梦良、蔡汝霖兄弟“护以石亭”呢？可喜者，当年蔡梦良建石龛之碑文现在还保存在虎岫寺中。该碑二尺正方，碑文竖书八行，共53字，兹抄录如下：“塔石保弟子蔡梦良汝霖为 / 先妣施二十九娘追资 / 生界舍钱造 / 真圣石龛一所永充 / 供奉 / 时绍兴乙亥八月望日题 / 石匠 林弟 / 都匠 郑成”（“/”为行与行之间隔）。可见蔡梦良、蔡汝霖兄弟二人于南宋绍兴乙亥年（1138年）才建造石龛供奉真圣（即“玄天上帝”）。也许有人也已经意识到虎岫寺肇始于唐贞观年间不符合史实，所以《永宁乡土资料汇编》载李艺所撰《虎岫禅寺》一文云：“据碑文记载及民间传说，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贞观年间（公元627—650年），虎岫岩这地方由于天然奇石绿荫环护，甘泉清流润泽，走惯了山路的南来北往商客旅人，便把它当

作一个天然的‘驿站’，经常在这里歇脚稍息。某日，有一旅人在虎岫岩一盘石上纳凉而昏昏睡去。睡梦中，忽见玄天上帝佛影毫光四射，醒来时，大呼玄天上帝显灵。此事传开，四里乡人，八方过客，每至虎岫岩，必对盘石祈拜。如此持续了五百年之久。”然而，人们祈拜盘石达“五百年”之久，实在难以想像，也难以令人信服。唯一合理的解释，是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年）蔡梦良、蔡汝霖兄弟建造石龕供奉玄天上帝以后，后人才把肇始于唐贞观年间的传说附会上去；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重修虎岫寺高攀撰写《重修虎岫禅寺碑辞》之时，不察实情，把传说也当成史实撰书上去。因此，笔者以为，虎岫寺当肇始于宋绍兴八年（1138年）蔡梦良、蔡汝霖兄弟建造石龕供奉玄天上帝之时（从历史背景来考察北、南宋时期宋真宗、仁宗、徽宗、钦宗、宁宗、理宗都先后敕封玄天上帝，把他尊为极高神圣，此时建石龕供奉玄天上帝较为合理；晋江在此前后建造的不少玄天上帝宫即可为佐证）。此石龕名为真武宫，高1.6丈，六角形状，整体花岗岩结构，异常坚固，故寺虽几经兴废，而石龕至20世纪60年代初仍完好无损。蔡梦良、蔡汝霖创建石龕以供奉玄天上帝的碑记，就嵌在石龕背后的墙壁上。然而，石龕不幸毁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初的1966年，1980年塔石村群众发起重修，1984年郭坑村李双喜女士捐资重建。在重建后的真武宫中，该碑记没有再嵌在玄天上帝背后的墙壁上，而是把它与其他有关文物存放在剧台左边的铁栏栅内，让游人参观鉴赏。

南宋淳熙丙午十三年（1186年），右丞相、仪国公梁克家因母病曾向万氏仙妃祈求立愈而在蔡巷（俗称“菜巷”）建造广灵庙，并立碑撰文记其事。碑文除阐述其缘起外，后云：“《礼》曰：

‘有功德于民者，则祀之。’神之功如此，泉人祀之也宜矣！守臣王潮请封护国英烈万氏仙妃，以章祀典焉。呜呼，庙貌岁久将颠，余忆母病，昔祷有感，故即城东置壝祀之。落成撰志，庸垂不朽。淳熙丙午孟冬吉日。”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梁克家提倡祭祀万氏仙妃是因为她‘有功德于民’。《礼记·礼运篇》云：“圣人制礼，则陈列鬼神之功，以为教也。”这明确地表明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道教的基本态度，即制礼敬事鬼神以教化百姓。梁克家此处也如是。

青阳石鼓庙顺正王也是一尊道教神祇。据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载：“王志 按 据明朝李伯元《青阳志》载为‘黄志’ 然而 道光《晋江县志》也载为‘王志’ 故依此) 潮阳人。生淳熙丙午 (1186年) 九月，为晋江蔡宝谟馆客，掌簿籍。有道术，能使瓦瓮赴水自涤，鹅群食草不越界限。嘉定庚辰 (1220年) 正月显化于青阳山石鼓庙，里人塑像祀之。辛巳 (1221年) 敕封殿前太尉。德祐时 (1275—1276年)，封护国上将军。明永乐中 (1403—1424年)，里人有从中官郑和使西洋者，奉神香火以行，舟次恍惚，见其灵助。和还朝，奏闻，敕封顺正王。”自此之后，顺正王香火一直流传至今。同庙奉祀者还有福佑真君通远王和仁福王陈益等。

龙王神是道教崇奉的动物神之一 (佛教同样崇拜龙王神)。宋代晋江主要有两座龙王庙：一为县东郊东湖的福远庙，一为龙湖畔的龙王庙。此外，承天寺中也建有龙王庙，清源山上同样有龙潭庙供奉龙王神等等。道教认为：“龙之为神，动则升霄汉，静则安江潭”。所以，《太上洞渊请雨龙王经》说，天旱诵经可召龙王普降喜雨。真德秀曾作《龙湖祝文》云：“按图志 晋邑之南，